

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培育与利用

李 山,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社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场域,孕育着丰富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的本质要素,是社区生命力源泉。但是,在现代化浪潮推动的社会变迁中,社区社会资本整体上处于衰落状态,社区生命力源泉日益枯竭。曾经的社区已成为“一个失去了的天堂”。为留住“远逝的天堂”,复兴昔日的温馨共同体,亟需加强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实质在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充分运用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实现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社会资本;社区建设;公共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4)03-0092-08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14.03.017

一、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将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正式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新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 119}。这种制度化的网络关系,能够为处于其中的个体赢得声誉,进而提供个体可获得物质性、情感性或象征性利益的保证。

在西方学者的努力下,社会资本研究逐步理论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从各自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不同学者给予社会资本不同的界定。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的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 and 有意创建的组织等,能够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2] 42}。罗纳德·波特(Ronald Burt)认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得到了使用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3] 9}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则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 2}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认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5] 12}

虽然“社会资本”定义众说纷纭,但是“社会资本”必然具有自身固有的内在规定性。社会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如同经济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具有资本的经济学属性。(1)资本的垫支性:资本是为未来的收益而进行的先期垫付性投入。(2)资本的运动性:资本要处在无休止的循环运动周期中,才能实现其增值。(3)资本的增值性:资本是一种资源存量,其本质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社会资本在具有资本共性的同时,亦呈现出自身的特有个性。(1)社会性:人们累积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计算,而更多的是营造合作互惠的条件,形塑良性的社会关系,促进集体行动的网络和规范,造就具有公共精神的共同体。(2)人格性:社会资本运作是基于人以及人所代表的

[收稿日期] 2013-08-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资助项目:10ZD&01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10-0430

[作者简介] 李山(1976-),男,山东莒南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吴理财(1970-),男,安徽潜山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治理与公共文化服

组织,自然地内在嵌入了特定的人格属性,具有一定的情感性,而非纯粹的市场理性。(3)无形性:社会资本嵌入人际关系网络中,难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更难以形态化,始终处于无形之中。(4)集体性:社会资本体现的是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属于集体物品,不能为一方所独占私有。

综合社会资本的内在属性,“社会资本”可以界定为社会中的主体为实现其在各个层面所预期达致的价值,在经营各种社会关系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主体间合作性互动网络关系以及集体行动规范的资源存量总和。由社会资本的定義可见,社会资本的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体及其组建的社会单元,譬如,公民、组织、社区、乃至国家等,社会资本的客体则是由人在社会生活中所缔结社会关系网络与共享价值规范的总和;社会资本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体间合作性互动所必需的要素,譬如,社会公共性、信任、互惠、互助、合作、制度规则、道德规范以及关系网络等。

社会资本主体始终处于规模不等的社会范畴之中,并为追求不同的预期价值不断进行着社会资本积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从社会资本主体纵向层次性角度来考察,社会资本可划分个人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社区间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等不同类型^[6]。这些社会资本处在纵横交错的网格之中,相互间发生着联系,形成互动性的关系网络。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中,社区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实质形态,是社区的本质性要素,它既涵盖个人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又联结社区间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

社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范畴,是孕育社会资本的“子宫”。社区(Gemeinschaft)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提出,是指一种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群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与富有人情味的场域。在社区里,人们基于情感动机形成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连接其成员的团结纽带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血缘、情感和伦理等本质意志^{[7] 54}。滕尼斯认为,不同于经由理性权衡建立起的社会,社区应是以家庭、村庄和组织等为载体,由人类历史之中自然生发的本质意志加以联结的和谐社会生活时空。社区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roof),“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找到的天堂”^{[8] 1-5}。一般说来,社区不仅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生活共同体,而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社会性存在。社区内不断生长着相互信任、守望相助与休戚与共的关系,培育着成员的强烈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的意识,分享着集体意识、理想信念与价值准则的共识,承担着参与、自治与发展的义务。在加德纳等人看来,除了社区的共同价值观与社区多样性之外,“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的”^{[9] 31}。这些社区内部的集体意识、价值规范、认同感、信任和互惠合作关系等社会性存在才是社区实质性的要素,而这种文化社会学意义的社区要素本身就是社会资本重要内涵和体现形式。“从社区的本质含义来看,社区或社区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10]。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的活力源泉,社区的繁盛离不开社区社会资本发育成长及其能动性发挥。可以说,社区的实质性内涵就是优良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

在本质意义上,社区建设是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温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只是仅仅涉及社区物质硬件设施的建造。加强社区建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11]。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培育、利用社区社会资本,重建“失去的天堂”。

二、社会变迁中的社区社会资本流失

中国传统社会是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伦理本位”社会,生于其间的每个人自始至终镶嵌于以血缘为基点扩展开来的由忠孝伦理编织的关系网络之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是“捆在土地上的中国”,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 36}。在这个熟人的乡土社会里孕育出的是“差序格局”的基本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按血缘亲疏,以己为核心,推己及人,形成一个由仁爱伦理主导的长幼尊卑有序的充满情义的关系之网。这种由儒家伦理形塑的“差序”之网是一种工具性纽带,人们依赖这张关系网络,守望相扶,风雨同舟,搭建起温馨的庇护“港湾”。社会凭借这张关系之网,等级有序,各安其份,建立起井然的规范秩序。可以说,这张关系网络就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毋庸置疑的是,在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

中,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镶嵌着浓厚的情与义,正是这种情义文化造就了居民自主自愿、彼此配合的合作互益行动,同时共同体的合作行动也不断地创造和建构着这种文化”^[13]。这些社会资本孕育生成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结构,并契合于传统社会场景,有效地维系着传统社会整体性运转,防止社会解组停摆。

中国历史延续至晚清时期,在外来强势的现代化压力下,中国社会遭遇到“总体性危机”,面临着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步履维艰,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与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转型尚未成功,实现现代化任务仍需努力!建国后,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被提上首要议事议程,这客观上亟需建立起有效的资源动员机制与社会管理机制,来提升现代化建设所需资源的汲取能力以及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强度。

为此,分别在农村和城市建立起政经社高度集中合一的“人民公社制”与“单位制”。社会成员被人为嵌入高度行政化的“总体性社会组织”之中,他们的社会身份由“社区人”转变为“体制人”。这些行政化的组织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形成了对其成员的完全控制,从而客观上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组织的全面依附。在行政化的组织制度与依附性的生存格局下,不可避免的将社会成员纳入到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中。在这种行政化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成为竞相应用的社会资本,理性的盲从成为自觉遵守的习惯。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在这里实现重叠,单位组织深度殖民私人生活世界,个人社会关系在封闭性的工作世界中铺开,几乎无法超越僵化的狭隘组织界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里,人们所能够营造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为价值取向结成的“同志式”交往关系为基本内容,而曾在传统社会中盛行于社会生活领域的许多原本性社会资本不再存在合法性,不断受到排斥与抵制。这种高度行政化的社会体制阻滞着社会资本正常发育成长,固化了社会结构界限,并抑制社会活力迸发。

为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终止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大刀阔斧改革僵化的社会组织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和“单位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深度融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快速蔓延,现代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理性计算成为普遍遵循的行为逻辑。现代性言说着个体权利至上的话语,倡导个体自由,鼓励个性发展。市场开放带来的流动性将人们推入“流动的时代”,过上“流动的生活”。在流沙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每个个体飘忽不定,都奋力为“自己而活”着,难以寻觅到可以驻足休憩的群落,更难以体验到逐渐逝去的曾经拥有的温馨的共同体生活。许多人几乎如同居无定所的“候鸟”,过着不断寄居他乡的匆匆过客者的生活,每个栖息地只不过是临时性的暂居。在流动的社会里,社群规范逐步屈从于个体至上的行为逻辑,原初的社群联结纽带松解,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社区认同更无从谈起,社区社会资本渐渐流失。

如今,自由翱翔的市场社会不再是一个飞行规则庞杂的熟人空间,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社,其中唯一的准则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更多的基于即时性的功利考量,非理性的互惠关系已失去市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彼此合作关系的维系不再是出于彼此间的信任,而变成了即时性金钱支付,金钱取代情义成为人们缔结社会关系的主要准则。市场理性取向的社会关系链接原则导致人们变得彼此疏离,出现了人际关系淡漠、社会聚合性消解、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弱化,最终致使社区社会资本由于培育土壤贫瘠而难以成长,社会资本存量日趋减少。

市场经济发展及其与之相伴生的现代主义思想确立,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公社制”与“单位制”相继解体,国家权力逐步选择性回缩,社会空间相应扩展。释放出来的社会空间为市场逻辑所主导,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开始两者相分离,原有的被行政化的社会生活事务逐步回归社会。大量“体制人”进入生活社区,成为“社区人”,社区成为人们新的栖息与社会活动空间场域。

从实质性角度看,当下的社区是市场经济规则以及数字网络技术包裹下的个体化社区,已不是滕尼斯意义上的原初共同体。市场理性稀释了人们最初具有的强固情感纽带,共同体的凝聚力减弱,加之国家权力收缩后,公民社会未能相应发育成熟以填补其真空,这致使个体纷纷从原有的社会范畴中“脱嵌”

出来。同时数字网络技术的快速大众化使社区居民的娱乐方式及其联系方式朝向“虚拟化”的方向发展,减少了彼此之间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机会。“有理由相信深层次的技术趋势正使我们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更加‘私人化’和‘个体化’,因此也使得很多社会资本形成的机会丧失”^{[14] 126}。在这种个体化的社区里,市场理性主义盛行,公共精神消解,人际关系淡薄,互助合作网络松弛,集体规范弱化,个体主义行为逻辑崛起,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结果是社区社会资本大量流失。社区的个体化进程加剧社区社会资本流失,社区社会资本流失则又加剧社区个体化趋势,这形成了一种持续增强的社区资本流失恶性循环。这种社区个体化在市场逻辑推动下,不断扩大贫富差距鸿沟,形成贫人与富人两大社会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这两大社会阶层会在社会生活中相互排斥,在社会空间中相互隔离,从而生成封闭性社会网络。这种封闭性会导致两个阶层间的信任缺失、合作与交流机会减少,带来社会分割和“孤岛效应”。社会分割会造成贫富差距鸿沟进一步扩大,致使各自社会阶层的社会网络更加封闭,反过来则又加剧社会分割,造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持续性流失,形成社区社会资本流失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虽然“人民公社制”与“单位制”已经解体,但国家权力只是“选择性退出”,许多原有行政化社会职能却转移到“村委会”与“居委会”。这些半行政化的组织难以有效发挥自治功能,却会阻碍民间组织成长,压缩民间协会、志愿者组织等非营利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抑制公民社会发育。发育不充分的公民社会不能有效提供社会资本孕育的组织载体,随之社区公共性、社区规范、合作规则等社区社会资本极难发育生长。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程度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零和博弈关系,政府的不恰当介入会导致非正式网络的衰落,削弱社区社会资本^{[2] 321}。社区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整合难度加大,进一步刺激“村委会”与“居委会”行政功能的强化。持续强化的行政化管制趋势会窒息社会活力,加速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这又生成一种相互强化的社区社会资本流失恶性循环机制。

任何社会都需积蓄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存量,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各部分间的有效联结,使社会充满旺盛活力,保障社会整体协调运转。相对而言,传统社会储备着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基本满足传统社会发展的需求。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现代社会尚未定型,社会结构不断解构而又重构,社会资本生产形式匮乏,原有社会资本加速流失。社区开始变得萧条衰落,缺乏生命力,曾经可以驻足、依赖的温馨“港湾”,业已成为“逝去的天堂”。

三、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区社会资本培育

为留住远逝的“天堂”,栖居于温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亟需推进社区建设。社区建设“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运动,实际上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补救,以重建被侵蚀了的社会资本”^[10]。作为社会生活的社区(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性得以充分呈现的空间场域,是社会资本的发源地,是社会生命力的源泉。社区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就是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营造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发展活力。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借以建构温馨“家园”。

当前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不是要全面复兴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因为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是在儒家伦理作为主导价值规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的,适合于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更不是要完全恢复革命时代的社会资本,因为这种社会资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最高价值规范的基于权力政治目的缔结的,服务于革命时代的政治社会需求;而是要培育起以现代社会价值规范为取向的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促进社会和谐的社区社会资本。由于传统与现代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历史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剪不断的时空流,不可能断裂与回流。当前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要扬弃传统社会的文化网络中的各种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适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力图斩断其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15] 53}。

传统乡土社会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典型农耕社会,人们世代守望、休戚与共地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中。村落共同体成为祖祖辈辈相继不绝的生产生活时空场域,在这个熟悉的场域中尊奉着血缘生命延续规则,人们分享着人类生来俱有的原始情感,共享着村落社区的强固认同感。在熟人村落社区中,人们彼此相知、相互信任、尊礼重道、诚信相待与合作相扶,过着以家庭为舞台的充满温情的相濡以沫的社会生活。人们在村落社区生活中合作互动生成的社会关系及其共享的价值规范逐渐沉积为一种文化,形成传

统文化网络。这些由共同体生活中产生出的传统文化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原生性来源,是其他社会资本的孕育成长的基础,“但是,利益本位和个体自由的现代性却越来越多地淹没着传统文化空间”^[13]。因此,激活某些优秀的原生性社会资本就成为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基础工程。在社区建设中,要强化尊老、爱幼与孝亲的家庭伦理,培养家庭共同体意识,育化利他性的情感资源,促进家庭和睦,进而增进社区和谐;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社会公益活动等各种载体,广泛宣传公共精神、诚实守信、合作共赢、邻里团结与互帮互助等价值规范与行为,形成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发育成长的社会氛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集体活动,诸如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清洁社区环境等,促进社区居民间的沟通交流,增进互信团结,增强社会归属感与凝聚力,建立起社区居民间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将城市社区网格化、农村社区村落化,在每个社区网格或村落中实现完全自治,释放居民自发开展良性社会互动的空间,促进居民间互信互助、互惠合作等集体行动。

伴随经济全球化滚滚洪流而来的是整个世界处于快速流动状态,步入“流动的时代”。社区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静态生活空间,而是开放性的流动生活领域。社区的异质性增强,“公共精神消解”,社区团结纽带消弱,个体行为逻辑凸显,社区社会资本不断流失,最终导致社区认同弱化。“所谓认同,是指一种‘我们的’意识的形成,对这个‘我们’有一种感情的投入。这是社区的最基本的基础,也是将社区与社区成员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纽带”^[16]。当下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紧迫任务是要强化社区认同。在社区建设中,要建立强有力的社区服务网络,加强社区服务职能,提供更多社区公共服务,譬如开展就业培训、开办社区托儿所、建立社区养老院与组织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等服务项目,采取各种措施解社区居民忧之所忧,使社区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增强社区居民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培育起同社区休戚与共命运感,实现社区社会活动经常化和制度化,激发社区成员关注社区事务的热情,扩大社区居民交际范围,增进社区成员间的交流和互信,形成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社区归属感,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开拓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治理的渠道,调动参与社区事务治理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居民的责任感,增强营造社区关系网络的主动性。

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现代性意识普遍兴起,市场理性主义广泛盛行,人们急于摆脱旧有社会关系束缚,追求个体自由。社区快速趋于个体化,个体从原有社会范畴中“脱嵌”出来,割裂了从前建立起的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四处飘荡的失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间缺乏彼此联结纽带,难以建立彼此互信的人际关系网络,更难以开展互惠性社会合作,从而无法有效生产社区社会资本。同时,在市场环境中,处在个体化状态的个体更加趋向贫富两极分化,固化社会阶层界限,形成社会分割,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必要前提是亟需对个体化的社区再整合,将“脱嵌”的个体“再嵌入”社区之中。在社区建设中,要加强社区制度规范建设,明确个体权利与义务,强化个体同社区的联结,保障社区居民的确定性,通过建立起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将个体“嵌入”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社会支持网络”(Social Support Networks),通过各种社区组织活动为遇到困难的社区居民提供非正式的工具性与情感性社会支持,增进社会沟通交往,建立互信、参与和合作的社会关系,制定社会公益活动规章条例,建立制度化的志愿者服务网络体系,推动个体加入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培育利他主义精神,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互惠合作与互助相扶行动,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社区居民基本生存发展权利,解除贫困社区居民的后顾之忧,增进社区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扶持弱势群体社会发展,缩小贫富两极分化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消融社会阶层鸿沟,增进社会共识,加强社会团结。

“人民公社制”与“单位制”解体后,人们的社会身份由“体制人”转变为“社区人”。虽然总体性社会组织业已解构,但它的许多行政职能却随之转移到社区。国家权力依然能够渗透社区基层社会,承担着一些办不好也不该承担的社会事务,“已经包办了许多我们曾经认为应当由有良好的社会自豪感和邻里互助意识的人们去做的事情”^[17] 219。行政权力对社区自治组织某种程度的入侵,导致社区治理结构行政化,“挤压”非正式社会网络,却又无法提供类似的价值与功能,侵蚀着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是要强化社区自治,促进社区公民社会成长。在社区建设中,要制定政策法规制度,重新界定政府的权利义务边界,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切实转变行政职能,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加强宏观领域治理,保

障社区组织自治,释放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广阔空间,建立政府、社会与公民的互信机制,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加强政府同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项目资助、契约外包、购买服务等方式,帮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网络的建立,建立起良好的社区社会事务伙伴合作关系,提高社区自组织的自治空间和自治能力,形成社区居民多维度参与治理网络,鼓励社区居民自由结社,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实践社会民主知识,强化权利保障意识,锻炼社区居民的组织管理与民主参与能力,推进社区多元民主自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完善有关社区自治的政策法规,强化社区居民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社区居民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法治素养与自律水平,逐步建立起社区自治与发展的规范性机制。

四、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区社会资本利用

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内部逐步形成互相信任、积极参与、互惠合作的关系网络结构及其社区制度规范等社会资本。有效利用这些社区社会资本能够保障成功开展社区集体行动,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就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18]。“社会资本在社区动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较高层次社会资本的社区,特别是社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社区的忠诚和归属感),更能够维持社区的稳定”^[19]。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资源,有助于推动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公共福祉。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社区社会资本又具有负的外部性,可能带来消极后果,诸如排斥外来者、限制个人自由和商业竞争、奉行标准化规范以及约束差异等^[20]。若从外部角度考察社区社会资本的可能消极后果:“社区社会资本可能被社区外的势力利用来控制社区并进而影响居民福祉和社区民主”;“就其对中国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而言,社会资本可以被普通市民用来追求民主权利和基层民主建设,也可能被地方当权者利用来阻碍基层民主化建设”^[21]。在利用社区社会资本推进社区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资本的正效应,限制乃至消除社区社会资本的负面效果。

社区场域不仅是私人生活领域,更是一个“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和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22]¹²⁵。在社区公共领域里,意志各异的社区居民走出私人领域,步入各种形式的社区公共空间,公开、平等地商讨共同关注的社区问题,在尊重差异性的协商对话中逐步达成某种共识,采取共同行动,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实现社区整合。这种在主体间交往中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于殊多性中构造出某个统一性来”,是“去掉不能相融的主观性之后的客观性”^[23]。这个“统一性”、“客观性”就是公共性,公共性的表现形式是“公共舆论”。“‘公共性’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对于抵御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工具主义的快速扩张有着实质性意义,是使个体得以超越狭隘的自我而关注公共生活的立基所在,还是形塑现代国家与民众间良性相倚、互为监督新格局的重要条件”^[24]。公共舆论言说社区价值规范,强化社区公共性,匡约极端个人主义行为。社区公共性的建构离不开在社区生活中产生的信任、合作、参与、关系网络以及社区价值规范等社区社会资本的支持协助,否则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枯竭而腐。与此同时,要谨防在差序格局逻辑下形成的“社会圈子”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圈子中心的个体都很容易将属于全体社群成员的整体利益用于满足其私欲,从而不断消解整个社群的公共性”^[25],致使某些公共性诉求容易走向“集体利己主义”。在一般意义上而言,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在社区建设中,要充分利用社区社会资本,营造出相关利益主体交往与协商的公共领域,建构起社区公共性,推进社区建设。因此,利用社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建构起“社区公共性”。

社区建设首先是要建构起社区公共性,但社区公共性建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治理的效度。社区治理是指公共部门、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行动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现社区公共事务多元协作共治,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社区治理的显著特征则体现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网络化以及公共参与。这些社区治理特征又建立在治理主体间彼此信任、共享价值准则与制度规范的基础之上的,而信任、参与、合作、网络化以及制度规范等又是社区社会资本的

核心内容与构成要素。由此可见,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藕联关系。譬如,社区生活中制度准则与道德规范等社会资本能够奠定社区治理的价值规范,社区内人际间的相互信任提供社区治理的参与合作网络;社区居民的频繁互动产生的“公共舆论”起到社区治理的社会舆论激励监督机制。可以说,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二者之间呈现出某种正相关关系,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区治理效度,进而还会影响到社区公共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资本总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反之,社区就会因居民不愿参与社区事务而缺乏认同感导致治理的目标难以实现”^[18]。在社区建设中,需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建立起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惠信任关系和积极参与网络,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协同合作,提供优良公共服务,有效推进社区治理,增进社区公共福祉,建构社区公共性。因此,利用社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度。

社区治理是建立起国家与社区公民社会的一种良好合作关系网络的互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社区治理效度也有赖于社区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程度,社区治理有效性是奠基在社区公民社会良性发展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公民社会当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26]。社区公民社会是在社区居民组建的各种民间组织的互动性合作中孕育生成的公共空间,在其中,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互信、互助、合作与整体主义纽带的特征,并为社区公共利益采取共同行动。这些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发育成长取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在社区里,人们彼此相熟、频繁互动与守望相助,在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普遍信任,培育出社区公共精神,形成互惠合作关系网络。凭借这些社区社会资本的纽带作用,社区居民基于共同兴趣与利益诉求,自愿聚合起来结成各种形式的民间社会组织。这些公民团体、志愿者组织、互助小组以及慈善组织等自愿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社会活动,建立个人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系,激发社区社会生活生命力,同时以各种形式采取集体行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最终实现社区“善治”。“从集体意义上说,这些小团体构成了一种人们需要在社区关怀的环境中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种公民能够相互进行一种个人对话和评价的地方,这种个人对话和评价不仅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而且也是民主的本质”^{[9] 31-32}。高存量社区社会资本能够孕育大量社区民间组织,进而促进公民社会成长,推动社区建设。在社区建设中,要充分运用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鼓励、支持社区居民以自愿结社的形式团结起来,结成形式多样的社会民间组织,推动公民社会发育成长,实现有效社区治理,建成一个充满活力、公平正义与安定有序的和谐社区。因此,利用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推动“社区公民社会”孕育成长。

社区公民社会的形成使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成为可能,在自治社区中,社区居民“逐渐将自己视为行政国家的公民……而不是把自己看作行政国家的顾客、当事人和受益人”^[27]，“公民不只是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短期需要,而是自己参与治理”^{[9] 111}。在社区自治场域中,社区居民成为自我治理的积极主体,以各种形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自主生产与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区成员共识基础上,旨在改善全体社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状况,由社区居民参与生产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个体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公共物品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现象,最终导致“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集体行动困局,因此一般理性的社区居民不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与供给。假若如此,社区公共服务极易陷入参与动力不足、供给匮乏、过度利用以及缺乏维护等困境。但是,人并不总是理性的,“人类以不理性的、团体导向方式采取不以个体效用为目的之行动,其发生频率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新古典主义模式显然不足以为我们勾勒人类本质的全貌”^{[28] 31}。人们可能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超越利己主义考量,采取集体行动,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社区居民在社区公民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的社区公共性、道德规范以及制度规则,而这些又根植于居民共同生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信任关系与休戚与共的情感纽带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能够孕育出这种社区“意识形态”,进而能够有效抑制过分的理性个人主义,减少交易成本,促进集体行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在一个普遍的信任感较强、人们愿意在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从事社会活动的社会中,交易成本无疑要小得多,这个社会也就会更有效率”^[16]。高存量社区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团结精神,强化制度约束与

道德自律,遏制过度贪婪和自利个人主义的蔓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有效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因此,利用社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供给“社区公共服务”。

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生活基本需求,改善社区整体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增进社区认同。较强的社区认同能够增强社区责任感,关心社区公共事务,增进社区居民参与,强化彼此信任与合作,减少社会矛盾冲突。“我们发现,社区认同与社区治安状况存在相关性。当社区的认同度较高时,其治安状况也较好”^[29],反之亦然。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不断参与“重复博弈”,逐步达成互惠合作共识,形成紧密关系网络体系,开辟出社区公共领域,生产出共享的社区制度、道德规范和公共舆论。这些社区制度、道德规范和公共舆论等社区社会资本能够产生约束个人行为的强大力量,惩治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社会失范现象,抑制违法动机,预防社区犯罪行为,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治安状况存在着较明显的相关性。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多,则社区治安状况越好;反之,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少,则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29]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社区社会资本来强化制度规范约束,减少社会矛盾冲突,抑制社会失范现象,减少犯罪行为,改善社区治安状况,有效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因此,利用社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维护“社区公共秩序”。

[参考文献]

- [1] Pierre Bourdieu, Loic Wacquant.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2]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 邓方,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3] 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 罗伯特·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王列, 赖海榕,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5] 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 [6] 程民选. 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J]. 学术月刊, 2007 (10).
- [7]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9.
- [8]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9] 珍妮·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 服务, 而不是掌舵[M]. 丁煌,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0] 吴平清.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乡村社区发展[J]. 河北学刊, 2009 (1).
- [11]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 郑戈,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郝彦辉, 刘威. 转型期城市基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J]. 东南学术, 2006 (5).
- [14]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Sesduster, 2000.
- [15]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 [16] 孙立平.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J]. 学海, 2001 (4).
- [17] 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 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M]. 胡利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18] 涂晓芳, 汪双凤.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08 (3).
- [19] Temkin K, Rohe W M. Socia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Stabi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Housing Policy Debate, 1998, 9(1).
- [20] Portes, Alejandro & Landolt, Patricia.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J].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6 (26).
- [21] 石发勇. 社会资本的属性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运作逻辑——以一个维权运动个案为例[J]. 学海, 2008 (3).
- [22] 汪晖. 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 [23] 晏辉. 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批判[J]. 哲学研究, 2011 (8).
- [24] 李友梅, 肖瑛, 黄晓春.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4).
- [25] 张江华. 卡里玛斯、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J]. 社会, 2010 (5).
- [26] 俞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 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 [27] Stivers Camilla. The Public Agency as Polis: “Active Citizenship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0, 22(1).
- [28] 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 [29] 袁振龙. 社区认同与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4).

[责任编辑: 雷 丹]